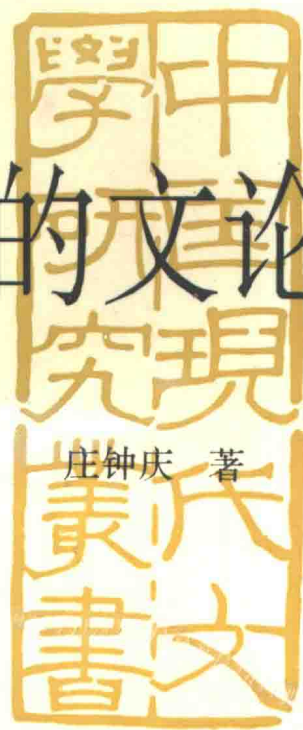


茅盾的文论历程



庄钟庆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茅盾的文论历程

庄钟庆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朱展程

茅盾的文论历程

庄钟庆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3 字数 176,000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21-1446-5/I·1136 定价：11.00元

在光縫中練行

庄鍾庆
一九八五
十月廿



编辑例言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长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多种方法研究从“五四”到当前的现代、当代文坛上种种文学现象，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本社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除了概括性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之外，还包括对各个历史阶段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和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坚持贯彻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同一研究题目，如果见解不同，只要立论明确、言之成理，我们愿意分别出版，以利于学术讨论。

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不包括资料部分，有关文学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成品，将由本社分别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表现人生、指导人生”，“全靠艺术” (1920—1922.9)	1
第二章	以“意象”和“审美观念”构成的艺术，反映 “被压迫民族和阶级的革命运动” (1922.9—1929.4)	33
第三章	“社会现象全面”的“认识”与“感情地去影响 读者的艺术手段”织成的中国革命左翼文学 (1929.5—1937.7)	62
第四章	“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的文学走向 (1937.7—1944.8)	106
第五章	朝向人民文艺的宽广大道 (1944.9—1949.9)	144
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文论的时代特征与民族风格 (1949.10—1966)	166
第七章	社会主义文学新长征的理论追求 (1976.10—1981.3)	217
第八章	“温故以知新”	233
后 记		240

第一章 “表现人生、指导人生”， “全靠艺术”

(1920—1922.9)

茅盾从1920年发表第一篇文学论文《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①开始到1922年9月发表的《“半斤”VS“八两”》^②为止，是他的为人生的文艺观的形成期。它是以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

—

当时茅盾的文论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倡文学应该表现人生，即表现“全人类的生活”^③，这种文学或者说是“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④，或者说是表现“社会——民族的人生”^⑤的文学。

茅盾主张文学反映社会人生，应“有时代特色做它的背景”，

①⑤ 《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小说月报》1920年第1号。

② 1922年9月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

③ 《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1921年第1号。

④ 《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1921年第7号。

表现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他在《创作的前途》一文中谈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要敢于表现“中国现在社会的背景”,例如“经济困难,内政腐败,兵祸,天灾”,还要注视社会中勇敢进取的方面,又要“描写新旧思想的冲突”,同时指出“未来的希望”、“光明的路”,“使新信仰与新理想”在人们的“心中震荡起来”。^①

茅盾认为,不论是客观地描写事物,或是主观地抒写理想,总须以人生为对象,这才是表现人生的文学。由此看来,表现人生的文学并不限于表现客观的现实,还包含着表现主观的理想。^②

茅盾认为,表现“全人类的生活”的为人生的文学,是“人的文学——真的文学”,这种文学表露的人的思想感情,“一定确是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这种“人的文学”,就“他本国而言,便是发展本国的国民文学、民族的文学”。^③

应该指出,茅盾的“人的文学”的主张,尽管有着含混的“全人类”说法,然而不能不看到确实是以表现民众思想感情为主要内容的。他在《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中说,文学反映“人的生活,——民众的生活”,它有着“替民众负荷祈福的使命”。^④

茅盾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中指出,为人生的人的文学,“是综合表现人生”的,创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他说:“不管它浪漫也好,写实也好,表象神秘都也好;一言以蔽之,这总是人的文学——真的文学。”

应当看到,茅盾提倡的“人的文学”,同周作人主张的“人的文学”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表现民众的生活与思想感情,后者

① 《小说月报》1921年第7号。

②③ 参见《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

④ 《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第3页,此文与刘贞晦作《中国文学变迁史略》一文合印一册,上海新文化书社1921年版。

重在提倡文学表现“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①。这两种关于人的文学观,在当时反对旧的文学观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各自的思想基础并不相同,影响也不尽一样。

还必须指出,茅盾认为写实、浪漫、表象神秘等创作方法,都可以纳入为人生的人的文学的见解,是可以讨论的。依据他的看法,浪漫主义是“和法国革命同时产生的”,“专描写上等的社会生活”,^②它是同贵族阶级相联系的^③,表象神秘派,产生于19世纪末,思想是颓丧和唯我的。^④诚然,它们各自反映一定的社会人生,但能否表现最大多数民众的思想感情,还是值得研究的。茅盾也说过“实在真能够描写当代人生的总是写实派了”^⑤。因为写实派“专描写下等社会的生活”^⑥,它是19世纪末“劳动运动萌发的时代”的产物^⑦。

当然,有些创作方法、流派,如浪漫派,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其中或为积极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作品是能反映民众的思想感情的。不过,作为描写方法来说,浪漫、象征和比喻等都可以成为为人生文学的表现手段。

茅盾提出为人生的文学观,是把文学同人类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确认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同时他也不否定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例如他在分析文学现象时,非常重视作家的思想在创作中的作用。他在《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一文中谈到,浪漫派作家由于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人生观“是欲创造,是重奋斗”,因而作品中富有反抗封建世俗的

① 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95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②③⑥⑦ 《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1920年第9期。

④ 参见《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1920年第1号。

⑤ 《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第14页。

精神。后来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浪漫派作家把主观的描写拔高了，流于空想的毛病。19世纪“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长足的进步”，唯物主义思想武装了现实派作家，他们的作品如实地揭露了现实人生中的丑恶，但是由于未能指明方向，终致使人失望。

在《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中茅盾指出，现代派诸家的创作目标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只不过是“有许多不满人意的地方”，当然，这同他们的思想倾向有密切联系。以未来派来说，20世纪初年，欧洲“物质文明骤然进化，科学和机械挟其雷霆万钧之力扫荡社会，人的心理咸受其影响”，“一般人的脑子里也旋转着‘力’‘速’两个字”，这便是那时人生的真相，未来派作为小中产阶级的代表受到这种现状的暗示，“自然也要做出崇拜力、崇拜速的作品来了”。达达派兴起于1916年——正当欧战剧烈，法国“牺牲一切以求一不可必得的目的，是何等可笑而无意识的事”。达达派作家避乱于世外桃源，“觉得世界上的事都是可笑的、无意识的”，“他们就要本此见解以创作”，这结果就是创作出“不可解释的东西”；再说，欧战时，“人类借了好听的冠冕堂皇的名词，实行破坏的时候。达达派亦感到了，所以他们实行破坏艺术上的一切法规”，不求人家懂得自己创作的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一败涂地，人们在危疑之中生活，终日烦闷，只求肉感的刺激，过着“变态的肉欲和自然人没有意义的主活”，另一方面德国战败后，却不肯认输，渴望的是“精神复苏”。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了对“人间悲观极了”的表现派，创作上的特点即“破弃一切旧规则而努力要创新的精神，以及变态性欲的生活”，这“都是现在这时代的人生的缩影”。^①

^① 《茅盾全集》第18卷第257—2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作家能动性的作用,除了思想观点外,还表现在感情方面。茅盾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一文中认为,“文学诚然不是绝对不许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感,只是这情感决不能仅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而应当同时代民众的情感相通。只有这样,作者才能在作品中反映时代民众的感情。

作家还必须重视艺术的表现力。茅盾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说:“创作文学时必不可缺的,是观察的能力与想象的能力”^①。在他看来,浪漫派、现实派各偏执一边,或重想象,或偏于观察,只有新浪漫派“能兼观察与想象”。当然,茅盾的这些看法并不精当,然而重视创作过程中的观察与想象的作用却是对的。

作家的个性、经历是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茅盾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认为:“大文豪的著作差不多都带着他的个性;一篇一篇反映着他生活史中各时期的境遇的”。这就是说,成功的创作,往往打下作家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的烙印。

创作需要作家的思想感情的传递、想象与观察的能力、个性与性格的展示等,这些都是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茅盾认为,从生活出发,运用艺术手段,以达到生活形象的塑造。因此,探讨反映生活的艺术特征是创作的不可缺少的问题,茅盾对此作了不少论述。他说,“文学是思想一面的东西,这话是不错的,然而文学的构成,却全靠艺术”^②。这就是说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必须依靠艺术手段。茅盾指出,文学的艺术手段是多方面的,例

① 《小说月报》1921年第2号。

② 《小说新潮栏宣言》,《小说月报》1920年第1号。

如“布局和描写”、“炼句”、“境界”等。^①有时，他简括地指出文学的特点，他说“用文字描写出来，这才是表现人生的文学，这是现在研究文学的人不可不知道的”^②。

茅盾不仅指出艺术的共同特征，而且对不同流派、创作方法的艺术手段也作了探究。他在《艺术的人生观》中说浪漫派的方法是“专注重主观方面和情绪方面”，写实派主张“照着物体的真相，老老实实描写出来”^③。他又在《文学批评的效力》中说“象征主义不是‘附会’，也不是‘猜谜’；是表现作者主观，捉摸事物内心的真实底手法”^④。

以文学同社会人生的相互关系的唯物主义思想为依据，茅盾对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茅盾在《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中认为，新文学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的。所以新文学“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⑤。新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人生，还要推进社会人生向美好方面发展。因此要求新文学“宣传新思想”^⑥，即“世界的现代思想”，或“现代精神”^⑦，诸如民主思想、科学思想。茅盾在《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中认为，新文学“要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因此，新文学“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这就是说新文学要为平民呼吁和鼓吹人道主义，即“出力的攻击腐败政府和袒护平民”^⑧，为“下流社会人的苦况”而“悲愤慷慨”。

① 《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1920年2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

②③ 《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④ 《学生杂志》1920年第8号。

⑤ 1921年7月11日《民国日报·觉悟》。

⑥ 《小说月报》1920年第1号。

⑦ 《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

⑧ 《安得列夫死耗》，《小说月报》1920年第1号。

慨”。^①

新文学要求反映人生，指导人生，且要为平民呼吁，因此文学工具必须接近广大人民，为他们所掌握。茅盾在《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中指出新文学“是普遍的性质”，“要用语体来做”，即提倡白话文作为新文学的文字工具。

茅盾指出新文学是为人生的，需要“用文学描写出来，这才是表现人生的文学”。可见，他认为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是新文学不可缺少的条件。

茅盾认为新文学必须具有民族色彩。他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指出，“现时种界国界以及语言差别尚未完全消灭以前”，“新文学运动都不免带着强烈的民族色彩”，中国新文学运动也不能例外。

在茅盾看来，文学要有民族色彩，必须表现民族的国民性。他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说，“所谓国民性并非指一国的风土民情，乃是指这一国国民共有的美的特性”。他又说，“中华这么一个民族，其国民性岂遂无一些美点？从前的文学家因为把文学的目的弄错了，所以不曾发挥这些美点，反而把劣点发挥了”。因此，必须强调表现民族的国民性的美点。只有表现国民性的文艺才能有真价值，才能在世界文学中占一席之地。

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同中国传统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茅盾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提出：“创造中国的新文艺时，西洋文学和中国旧文学都有几分的帮助”。他主张从中国旧文学和西洋文学中汲取有用的成分，“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因此既要反对“守旧”的倾向，也要反对“徒然‘慕欧’”的现象。

① 《俄国近代文学杂谭》(上)，《小说月报》1920年第1号。

茅盾指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这是根据进化论提出来的。他认为新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是“随时迁善”的。然而，他还认为新文学的形成与变迁又是充满斗争的，决非和平进化。他在《独创与因袭》一文中说，“新文学革了旧文学底命，自当脱胎换骨，一新面目。”^①这就清楚地说明新文学代替旧文学，必须经过革命才能完成“创造”新文学的使命。

据此，茅盾坚决反对新旧文学平行的折衷派、封建复古派、鸳鸯蝴蝶派以及唯美主义文学，为新文学的发展扫清道路。

茅盾认为新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同形形色色的封建文学作坚决而持久的斗争。这种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与不妥协性，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思想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因为，只有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才能对封建文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由此看来，茅盾关于新文学的看法既有进化观念，又有革命思想，这是反封建斗争的民主主义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因素的交汇。茅盾对于新文学的见解具有自己的特点。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②中认为新文学是“文学进化”的，这是与茅盾相同的，然而胡适却主张“文学改良”，茅盾则主张新文学必须“革了旧文学底命”的。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主张新文学应该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③尽管其中“博爱的精神”的提法尚欠周到，然而“坚信的主义”却是针对胡适反对的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旨在申明新文学必须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作用。这就为新文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在当时是少有的。至于鲁迅，主要是从创作上体现新文学彻底而不妥协的民主革命精神，以显示它是符合新

① 1922年1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

② 《新青年》1917年第5号。

③ 1919年12月8日《星期日》(社会问题号)。

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的。

茅盾主张：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作家在表现生活的过程中应发挥独特的能动作用。形成这种唯物主义文艺观，并非偶然。他是在同唯心主义文学观的斗争中建立这种文艺观的。他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竭力抨击新文学中出现的两种承袭古来脱离社会生活谈论文学的观念的倾向。一是“文以载道”的观念，它“抛弃真正的人生不去观察不去描写，只知把圣经贤传上朽腐了的格言作为全篇‘柱意’，凭空去想象出些人事”，二是“游戏”的观念，本着“吟风弄月文人风流的素志，游戏起笔墨来，结果也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①他还批判了鸳鸯蝴蝶派的游戏的文学观念。他指出，依据“文以载道”及“游戏文学”观念创作的文学作品必然同人类隔绝，同社会隔绝。

茅盾善于吸收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良遗产，以丰富文学同社会人生的关系的理论。他在《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中说，“文艺是人生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缩影”，“这种话，初看似乎是西洋来的‘舶来品’，不是‘国货’，然而细想起来，中国古人原也早悟到这一层的。古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这就是说，怎么样的社会背景产生出怎么样的文艺，怎么样的文艺是怎么样的人生反映”。茅盾还在《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中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学中表现社会人生的作品，指出那“的的确确是真文学，是人的文学了”^②。他还引用古代文论中的一些说法如神韵等，来概括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

茅盾还借鉴外国进步的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同社会人生的关系的看法。他在《文学与人生》中说：“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

^① 《小说月报》1922年第7号。

^② 1921年5月10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

最普通的标语：是‘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①茅盾也从这种文学必须反映社会人生的理论，引出新文学应当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主张来，同时又根据外国作家的思想同创作的关系的实例，阐述作家的革命思想在创作中的作用。

茅盾善于从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总结文学同社会生活关系的历史经验，他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说：“翻开西洋的文学史来看，见他由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这样一连串的变迁，每进一步，便把文学的定义修改了一下，便把文学和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这“无非欲使文学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茅盾认为这是世界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尽管中国新文学“带着强烈的民族色彩”，然而也不能逾越它。他还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从西洋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探索文学的艺术特征及各种流派的艺术方法。

茅盾的文学同生活的互相关系的观念的树立，是同他具有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分不开的。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突出表现在观察和回答现实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方面。他把现实生活实践，看作思想观念的可靠依据。他在《我们现在所能做而且必须做的》一文中，强调面对“社会实际上的需要”，重视“现在所能做的所必需做的”，^②注重合乎实际的思想。这种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用于文学，必然承认文学来源于生活实际，注重作家主观能动性在创作中的作用，同时也要从实践中检验主观认识是否合乎客观的反映。

关于文学同生活的关系，李大钊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50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② 1921年6月30日《民国日报·觉悟》。

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从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加以论证。他指出“上层的变动随着基址的变动而变动”^①，阐述作为上层建筑的艺术同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然而他并没有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论述生活同文学的辩证关系。鲁迅也未能从这方面作出理论的分析，他或是结合美术创作阐发进步的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②的观点，或从创作实践谈到作品描写生活的问题，如说《孔乙己》是“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生活”^③的，称赞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是“描写现代生活”^④的。

文学研究会同仁在论述文学同生活的关系方面的文字为数不少，其中不乏比较值得注意的见解。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主张文学同“人生相关”，“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受与人生的解释”。^⑤郑振铎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中，同茅盾一样反对“文以载道”与“娱乐”派的文学观，主张“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⑥可以看出，茅盾当时在论述文学同社会的关系方面相当具体而周全，然而还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来加以论述。

创造社对文学同生活关系方面的论述也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几乎不谈文学同社会现实的关系，只谈文学同主客观的关系，其中特别强调主观创造。郭沫若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谈到“对于艺术上的见解，终觉不当是反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357、35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热风·随感录四十三》。

③ 《呐喊·孔乙己·附记》。

④ 《译文序跋集·〈幸福〉译者附记》。

⑤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41页。

⑥ 1922年5月1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